

現代名著譯叢

何炳棣

著

徐泓

譯注

明清社會史論

THE LADDER OF SUCCESS

IMPERIAL CHINA:

SUBJ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現代名著譯叢

明清社會史論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何炳棣著
徐泓譯注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現代名著譯叢

明清社會史論

2013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科會經典譯注

著者 何炳棣
譯注者 徐泓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11
台北聯經書房：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 22302425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編輯 梅心怡
校對 呂佳真
封面設計 沈佳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214-2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 Ping-Ti Ho 1962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獻給我懷念的父親

中譯本自序

我所寫的第二部著作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簡譯為《明清社會史論》。英文原書於1962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初版，距今已近半世紀矣。我生平治史素重選題，始自明清，上溯宋金的人口、大北魏洛陽城區；數年之後又自修多種科學工具，於1975年以英文完成《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一書。之後三十年間，中國各地豐富而多彩的考古發現，幫我駁斥了西方與東南亞人類學家以及考古學家對《東方的搖籃》的惡意攻擊。上世紀末，我先後自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退休後的二十餘年來，又另闢領域，專攻先秦思想史與制度史，對數十年前已經問世的有關明清人口以及社會階層間流動的舊著，不免有點陌生之感了。

我感到高興的是，台灣的明史專家徐泓教授在過去數十年間先後主持台大、香港科大、暨南、東吳等大學教研工作之餘，致力於拙著《明清社會史論》的譯注工作。徐注的特色是力求詳盡，例如我在原書中提到明太祖開國伊始，由於亟需人才，往往數以百計的國子監生，無需較高的功名，即可出任州縣，甚至可當更高的地方或中央官吏。但是正統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變後，明英宗被俘，蒙古入侵京郊，明政府遂自景泰元年（1450）起，不得已頒發一系列的諭令，准許納馬納粟即可入監讀書，初限生員，倏而惠及一般庶

民。此後十九年間捐監者共6,869人，佔全部監生16,070名的42.6%，導致州縣底層吏員供不應求的現象，降低了監生的社會地位。我早年治史多在美東國會、哥大、哈佛等漢學圖書館，遍覽多種史料，而敘事則力求簡要。上引史實僅採自簡明可信的《明會要》，徐注除《明會要》外，詳列《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明史選舉志》、黃瑜的《雙槐歲鈔》、其孫黃佐的《南疆志》、《明英宗實錄》，以及近年郭培貴的《明史選舉志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此一底注長達八、九百字，足以教導入門者如何收集與運用史料。

譯者注釋詳盡，無意中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與方式。事緣上世紀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出版社和許多學術期刊，爲了節省經費，把正文與底注中的所有漢字，照例擠排在書尾。即就這本《明清社會史論》而言，成千上百的中文人名、地名、年代、官名、科名、書名等等，閱讀時必須往返檢索，不勝其煩。徐譯將全書每一底注都與同頁正文密切聯繫，讀來令人重生親切之感。

長達萬言的譯注，詳列並評介過去幾十年來凡涉及明清社會階層、結構與流動的各種文字的專書與論文，對我這個原作者以及廣大讀者都極有參考價值。除了《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一書外，我從不回頭深究舊著，所以1962年出版《明清社會史論》後，未再注意這方面的著作。在華府與台北斷交，兩岸極度緊張的政治情勢下，我雖盡最大努力，僅得八十種具有登科者三代履歷的名錄，可用以分析明清兩代一萬四、五千名進士和晚清二萬五千名舉人及特種貢生的家世背景。我曾幾度函請寧波范氏天一閣提供明代進士登科錄的微捲，都無結果；不料〈譯者序〉中提到竟有大陸學人抨擊拙著弱點之一是未利用遲至2006年才由寧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

至於〈譯者序〉詳列各種語文所寫與拙著類似的專著，或由拙著啓發的論文，其中對我早年的方法、觀點、分類、量化等等，都不免有所批評或質疑。這些批評與質疑或爲我前所不知，或久知而不答，或遲遲才作答，之所以如此，因我近年將精力專注於先秦思想史的攻堅。然而對於早年著作所據原始史料之豐富多彩，以及論證之平衡有力，仍具有相當信心。《明清社會史論》從三萬四、五千例案中所得出家世背景的分類和量化，應與明清五百餘年社會階層間之流動率，大體相符而不悖。〈譯者序〉謂拙著「無論在運用的史料與統計分析的方法上，其開創的地位，及獲致結論的堅實，均歷久彌新，屹立不動」。此一評價乃譯者比較1962年以來中、日、韓類似著作後所得，是接近事實的。事實上，當英文原著出版後，即已獲得高度評價，如名聞寰宇，主編《劍橋中國史》的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早年曾在他主編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集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發表書評，對拙著推介如下：

This is a brilliant book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same author's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provides the English reader with the best outlin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Ch'ing China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the author combines first-rate Chinese scholarship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 lively creative imagination, and a sharp eye for telling illustrative detail.(這是一部輝煌的著作，與同一作者所寫

《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均為英文讀者提供了在所有語文中最精要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綱。此書作者之所以能達到第一流水準，由於他能兼通中國傳統學問與近代西方史學之長，且具充沛的原創想像力，並能以敏銳的眼光寫出動人的案例。）

徐序與崔評對我早年學術著作價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二十餘年來，孜孜不倦考證先秦思想與制度的精神支柱。

這本《明清社會史論》在我所有的著作裡，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較多，也最為謹慎，曾引起不少學者仿效。但此書問世若干年後，驀然回首，我對某些社科觀點、方法與理論逐漸感到失望與懷疑，最主要是由於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滿足歷史學家所堅持的必要數量和種型的堅實史料，以致理論華而不實，容易趨於空誕。因此我自退休以來二十餘年間，「僅」求諸己，致力於考證學的更上層樓，欣然頗有所獲。此日回想，這本舊著可稱我個人學術路程上的一個分水嶺，而今舊著以「譯注」的新顏出現，於我個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對廣大的中文讀者有所助益。我當然也要感謝徐泓教授不懈的努力。

✱

✱

✱

我於序文撰就之後，重閱〈譯者序〉，發現第三章注7譯者案語謂拙著當初不利用硃卷，是由於潘光旦和費孝通在清華大學《社

* 【譯者按】：何先生自題《中國人口史論》，中譯本改名《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會科學》第9卷第1期(1947年10月)上合撰的〈科舉與社會流動〉一文，文中引用了晚清直隸、江蘇、浙江、山東諸地硃卷917種，而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僅藏有300多種。我幾十年來不曾公開討論硃卷的史料價值，實因雅不願與潘仲昂師、費孝通學長辯難，當初友朋之中有瞿同祖兄(2010年6月在北京逝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硃卷即使具有種種優點，並不是研究社會階層間流動的理想史料。硃卷大致包括兩個部分：譜系和師承。譜系詳於直系與近支，兼及母系各世代的姻戚，故能「追尋各家婚姻結合，推見各家生物性的關聯」。師承包括硃卷作者的學術源流，詳述受業、問學、授知三種有關個人的思想和成就。類此生物和社會教育並重的資料有利於潘先生對遺傳與優生學的探討。然而硃卷的內涵即使優於家譜，若不能置於硃卷作者同年的全部齒錄之中來看，仍無法得出社會階層間流動率的統計。其中至理，容後有餘力時再詳論之。

何炳棣

於美國加州爾灣龜岩村

2011年12月26日

第二版自序

我在第二版校正了許多排版和數據及史實的錯誤，在此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丁龍漢學榮譽講座教授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 Dean Lung Professor Emeritus)，因他惠予提供本書第一版的勘誤表；他以自己主持「《明代名人傳》編寫計畫」(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所累積的大量資料中擷取資料，來校正拙作中若干明代官員與學者的年代與生平事蹟的疏誤，這幾乎是別人無法辦到的。因拙於校對，這些版本的校訂大部分要歸功於富路德教授。

這一版最主要的修訂在於統計數字，在這本書的書稿交給哥大出版社後不久，我才收到郵寄誤期遲到的1958年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讓我非常驚喜的是：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進士登科錄、會試錄和鄉試錄的書目，而且都記載著舉子先人的資訊，可以填補先前我的統計數字系列中某些關鍵年代的空隙。這些極為珍貴的登科錄、會試錄和鄉試錄，原來是翁同龢(1830-1904)的私人收藏，他是晚清兩位皇帝的老師，一般被西方人認為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中的關鍵性「首相」。在最近一次到東亞的旅行中，我也偶然在中研院史語所發現四種稀見的明朝進士登科錄；結果我就利用這些新收到的資料修正與增補表9、表10與表12，這幾個表是本研究的統計經線中最值得注意的。

本書出版以來，相關的二手研究成果增加了許多，雖然不是直接觸及明清中國社會流動問題，但是與本研究討論的某些制度面相關，在此只提幾件：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是至今研究明代黃冊制度史最詳盡的著作；賀凱教授的〈明朝

政府組織》，《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21卷，1958年12月(Charles O.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XI, December, 1958)，直到我交出書稿時仍未出刊；這篇文章的許多好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明朝主要和次要政府機構與職官名稱的英文譯名。我自己的中文書《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專章論述各地商幫為提供趕考的家鄉子弟食宿，在北京與各省城、府城設置的會館。由於出版經費的昂貴，不可能對本書內容全面重加增補，尤其書目是在日本印的，最為費時。儘管整本書的原來頁碼有必要保留，在本書第二版，我還是對文本與統計方面做了相當大的改進。

在過去幾年，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些社會科學家比史學家與漢學家更不願有系統地關注各種中國傳記資料的不同性質問題，而這些資料卻是許多現代研究傳統中國社會流動的依據。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無疑地是語言文字的障礙，我可以無愧地說：在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研究傳統中國社會流動，評估所依據的各種中國傳記資料，充分的目標是要引起那些不熟悉中文文獻資料學者的注意。本書的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的社會流動率，也可能很難超越」（原書頁258，中譯本頁318）；認為這獨一的結論很難估量的學者，就請他們讀讀狄伯教授(Vernon K. Dibble)和我合寫，在《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學報》第3卷3期(1961年4月)發表的〈社會流動的比較研究〉(一個辯論)(Vernon K. Dibble and Ping-ti H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III, no. 3, April, 1961)。

何炳棣

芝加哥，1967年4月

第一版自序

對研究明清社會與制度史的學者來說，能使用的文獻不但數量大而且品質非凡。這批資料中最有系統性的是進士登科錄(擁有進士功名者幾乎自動成爲中階官員)，它提供舉子三代祖先正確的資訊。這裡使用的四十八種登科錄等名錄，共含12,226個案例，正好涵蓋整個明清時代，始於明朝第一次進士考試的洪武四年(1371)，終於科舉制度廢除的光緒三十年(1904)。這些資料構成這個研究統計數據的主體，另外補充清代最後幾百年的二十種舉人與貢生的名簿同年齒錄(擁有這些中階科名者有資格受任爲低階官員)，分析的總案例數達23,480個之多，再補充長江下游爲主的三種生員題名錄(擁有這些初階科名者並不能受任爲低階官員)，其中兩種涵蓋順治元年至光緒三十年(1644-1904)，另一種涵蓋洪武元年(1368)以來的整個明清時期。對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造成的社會流動的統計研究，構成本研究的經線。

本研究的緯線主要包含評量各種形式的質性證據，諸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等。雖然大部分是不能計量的，但仍然可以闡明社會流動各面向的一般情況，如個人與家庭從一個身分地位移到另一個身分地位，幾乎不存在有效的法律與社會壁壘和阻礙；社會流動存在著制度化而非制度化因素；著名的家庭和家族都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其社會與經濟地位逐漸和其他家庭、家族趨於平等；導致社會流動的某些社會概念與神話，向某些部分人民的滲透擴散等。本書研究舉業造成的社會流動及一般社會流動的主要結論，取自累積的統計

的與質性的事證所做的注釋、評估及總結。

就如本書的副題所指出的，我的研究普遍受益於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我必須明確地說：本研究的重點在社會與制度史的一些有機面向，而不是歷史社會學。歷史資料不論其品質多好、數量多大，都很少能如現代社會學調查所要求的那樣；歷史學家不能如社會學家一般，以精巧設計的問卷與田野調查的實施來找到特定的資料。此外，統計數據的分類和一些社會現象的注釋，都需要仔細討論某些面向的制度史，雖然對社會科學家來說，這種工作是費力而乏味，但對歷史學家來說卻十分重要。因此，本書處理社會流動的各個層面與處理制度史一樣多，討論的焦點則集中於官僚體系的社會成分。為避免讀者誤解，我曾認真地考慮這本書的副題是否需要改易；最後我還是決定保留這個副題，主要是因為我使用的理論框架，在最近的十五年，已為研究社會流動的學者所擴大和改進。

關於一個跨度長達五個半世紀龐大而複雜的社會，有些相關的論題，可以說，比研究血液循環更具挑戰性和啓迪性。統治階級的社會成分和其他更一般的社會流動面向，向來就是我長期以來研究明清史計畫中的優先項目，社會流動的研究工作始於1954年秋天，幾乎在同時我也初步發現一個歷史大謎團的破解，那就是明清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

在籌畫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獲益於結交各種學科的學者以及與他們多年來的討論。我受惠於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圖書館長尼爾·哈羅先生(Neal Harlow)，他為我取得這個研究所需要的一般資料與稀見資料；人類學與社會學系的霍桑教授(Harry B. Howthorn)、貝蕭教授(Cyril Belshaw)、尼格理教授(Kasper D. Naegle)和柏理申教授(Bernard R. Blishen)，在這研究的形成階段給予的諮詢；英文系的史密斯教授(Marion B. Smith)在文字編輯上給

予的幫助。我必須特別感謝瞿同祖先生，他原先在哥倫比亞大學，現在哈佛大學，他是結合社會學與漢學最有成就的學者，我們早從1945年就展開長期的討論；感謝巴納德學院的巴伯教授(Bernard Barber of Barnard College)與巴伯博士(Elinor Barber)為我閱讀本書導論一章的初稿；感謝耶魯大學芮瑪麗教授(Mary C. Wright of Yale University)為我讀整本書的草稿；感謝芝加哥大學教授，同時也是《社會與歷史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的主編索普教授(Sylvia L. Thrupp)和另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狄伯(Vernon K. Dibble)，他們為評論我這個研究的期中報告，特別寫了一篇文章，幫我澄清某些基本概念。我也應該要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蕭梅克小姐(Elizabeth L. Shoemaker)為這本書做的編輯工作。

我受惠最多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東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 Congress Library)、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與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Library)，感謝他們的慷慨相助。感謝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館長裘開明博士，他對我不計其數的圖書館館際借書要求有求必應。我也要感謝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先生和北京國家圖書館王一飛副館長為我複製極為稀見的明朝與清朝初年的進士登科錄。

本研究如果沒有來自以下機構的贊助是無法進行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研究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三個暑期研究獎金，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慷慨贈予一整年的資深研究獎助金。1958年9月到1959年8月，我在哥大擔任資深研究員，此期間經常和韋慕庭教授及其他的研究所同仁來往，使我獲益良多。我要特別感謝施堅雅教授(G. William Skinner)對我在技術層面的寶貴批評，他當時在哥

大，現在康乃爾(Cornell)。希望以此書作為我對母校那快樂而又豐收一年的小小紀念。

何炳棣

1961年5月

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

譯者序

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會史論》

何炳棣教授於2012年6月7日清晨7點11分在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壽九十五歲，史學界失去一位跨世紀的大師。¹ 何炳棣先生原來念的是英國史，² 後來轉治中國史，他的研究領域廣，包括揚州鹽商、明清至民國的人口、明清會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美洲新大陸作物輸入中國、北魏洛陽城、明代土地數據、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黃土與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運用史料之精妙，方法與史識之獨創，轟動史林，驚動萬教(教育界)，當今華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³

何先生不滿於中國文史研究被洋人歸類為「漢學」(Sinology)，因為「漢學」是西方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產物，他們卑視漢學，不置之於西方為主流的學術殿堂正殿。⁴ 因此，何先生治中國史都選重要的大

1 Sidney Ho, "Professor Ping-ti Ho (1917-2012) 何炳棣 Notification & Remembrance," 07 June, 2012.

2 何先生於1952年以〈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土地改革運動與土地政策研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一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3 參見徐泓，〈何炳棣教授的明清史研究〉，《明代研究》，第18期(2012.06)，頁23-47。

4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 1996), pp. 96-118. 顧明棟，〈漢學、漢學主義與東方主義〉，《學術月刊》，12(上海，2010)，頁5-13。張寬，〈薩伊德的「東方

問題，成果都由重量級的西方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出版，要與西方史家進行對話。⁵ 何先生的學術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1965年榮獲芝加哥大學聘為地位崇高的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⁶ 並於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亞裔會長。

何先生擅長於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他在《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以文獻、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證明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亞的一源說，連強力主張這種學說而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稱的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為之折服。⁷

(續)

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瞭望》，27(北京，1995)，頁36-37。

5 如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等出版社，*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Journal Asian Stud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等學術期刊。

6 “The chai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amed for the medievalist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President of this association (AHA) in 1941, is now held by Professor Ping-ti Ho, who was born in Tientsin(天津) and is a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 in Taipei.” John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70’s,”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es*, 1968. http://www.historians.org/info/aha_history/jkfairbank.htm. (擷取時間：2012年6月18日)

7 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贊揚何先生的論證紮實，難以推翻。在這本書(*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The Chinese*